



祖芬的中国故事 13

在日本 看中国

○ 陈祖芬 著

○ 河北教育出版社

I25
418



13 陈祖芬的中国故事

在日本 看中国

○ 陈祖芬 著

○ 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日本看中国/陈祖芬著. —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
2001.5

(陈祖芬的中国故事; 13)

ISBN 7-5434-4206-X

I. 在… II. 陈… III. 报告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9219 号

丛 书 名	陈祖芬的中国故事
书 名	在日本看中国
作 者	陈祖芬

出版发行	河北教育出版社
	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印 刷	河北新华印刷二厂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3.5
字 数	75 千字
版 次	2001 年 9 月第 1 版
	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2000
书 号	ISBN 7-5434-4206-X/I·589
定 价	4.6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南洋姐和原子弹	(1)
我的世界语	(6)
自转和公转	(14)
为你着想	(32)



南洋姐和原子弹

我好像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在讲话。

当然，这是刹那间的感觉。我的面前坐着的是一个远比我更有特色的女性——山崎朋子。她那么漂亮，虽然已经五十出头了。她那对大眼睛那么犀利有神，虽然她身体不好，生活坎坷，身上和心上都有伤痕。几年前我看日本电影《望乡》时，栗原小卷演的女记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此后我采访时每每想到她，希望自己能够像她那样坚韧、刻苦，但又自知不如她。我访日时方知那个女记者的原形就是山崎朋子。《望乡》是根据她采写的长篇报告文学《山打根八号妓院》改编的。这部报告文学发表后印了三十八版！改编电影后，有关人士邀她自己演自己——那个女记者。她不同意，“我只想写报告文学。”她说。



这位日本报告文学作家一见我就拿出了笔和纸，我无形中感到自己“落到了”被采访的地位。而我这次前往她家更多的是想去了解她。现在我感到了棋逢对手，结果当然得有一方相让，或者是败退下来。不管是因为客随主便，还是因为其他种种，总之我感到我第一次由希望采访别人而变成被别人采访了。不过我知道，对于一个职业写报告文学的人，他（她）的职业病就是无时不在采访。所以，尽管我打的主要是守球，有空子我就要发一个问题过去。

山崎朋子致力于写社会问题，尤其是妇女问题。每年用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进行社会调查。她问我，我外出采访的费用是自己出还是谁出呢？我说我给哪个编辑部写就由那家编辑部出。她那对大眼睛这时愈发睁大了。她说她真羡慕我，不仅有工资，而且还有人出旅差费！在日本，一般都是费用自理。

日本生活的压迫感、紧张感，使很多人愿意看大众文学，甚至是漫画。我看见过有的商场里本来是卖书的，后来全换成漫画杂志了。日本竟有这么多、这么厚的漫画杂志！我手头的一本《少年漫画》是十六开本大的，三百四十页厚，而且是周刊。日本每周、每日要生产多少漫画！难道一个国家在高速生产电子产品的同时就得高速派生漫画？

有些作家不能不写些迎合大众口味的作品——不能不考虑稿费收入。山崎朋子只是执著地写她的报告文学，而且往往需要她自己支出旅差费，自然很艰难。“越是难我越是要干，越是难就使我越是想干。”她说，“一工作起来我就不累了。”

我以为她去采访《望乡》中的那个南洋姐阿崎婆已经够苦了，可是她说她去东南亚一些地方比这更苦。“物质的苦我不怕，我怕精神的苦。”她说。



她指的是原子弹问题。她原先在广岛读书。十三岁那年,就在投原子弹的前些日子,她正好去乡下了。之后,她的同学们都死了。“我总觉得对不起他们。我应该和他们一起去死的!”她的眼神有些混乱。我知道她一讲这就受不了。原子弹的灾难是她最想去采访的,但她至今不能去采访。“我精神上受不了。”她又说。

“这次你去不去广岛?”她问我。

“去。”

“希望你一定写一写广岛的原子弹问题!”

广岛那颗原子弹距今四十年了。可是在山崎朋子,好像这是昨天才发生的事。这是为什么?

很遗憾,这次因为日程安排太累,我们只能在广岛和平纪念馆所在的和平公园停留有限时间。这天风雨交加,不过这点风比起原子弹爆炸时的风算得什么哟!原子弹爆炸时,随着强烈的热线和放射线的辐射,周围空气由巨大的膨胀而变成一股暴风,暴风前端有一股比音速还快的冲击波,最大风速每秒可达四百四十米。爆炸中心的热线温度为三千度至四百度(铁的熔点是一千五百度左右)。更不用说放射线的摧毁性力量!1945年8月6日上午八时十五分,广岛在瞬间化为焦土。

我望着纪念馆图片上一个一个烧坏的脸部和蜷曲的躯体。我不敢看,不忍看。在这样的强烈刺激下,我难受得蜷缩起来。造成这些变形的人的是那些变形的心,变态的心!那些制造战争的人,他们的心灵也应该是一片废墟!

纪念馆楼前有一个慰灵碑,碑上刻着在原子弹残害下已经查出姓名的十一万三千个死者的名字,包括一些被炸死的美国兵的名字。世间高级动物中,只有人类更善于自相残杀。老虎不吃老虎,狮子不吃狮子。但是人类不断地有战争、凶杀、残害、破坏。日



本每天的电视新闻里，我们每天的国际新闻里，世界总是叫人不得安宁。和平公园的慰灵碑上刻着：安息吧，不会重复过去的错误了。这只是善良人的希冀，实际上类似的错误一直不断，更大的错误不是没有发生的土壤。

风雨中，和平公园里依然是满地的和平鸽。它们不怕雨吗？当年广岛爆炸后二十分钟到两小时内下起了黑雨。雨水把放射能愈发地向四处散布，波及远方。这些和平鸽莫非是死者的魂？所以它们冒着风雨也要站在纪念馆的周围，向所有前来参观的人执著的呼吁和平。

院里的樱花似乎为了强化这种气氛，纷纷落下。我们来日本后樱花盛开了，一大片樱花树像一大群穿着粉红纱裙的芭蕾舞演员。若是绿树丛中只有一棵樱花树，又像是一群严严实实地穿着西服革履的绅士中间，站着一个穿着粉红晨服的少女，愈发突出她的娇艳。但此时的樱花却使我想起我读过的日本女作家佐多稻子的散文《谈花》。她写到战时她和女儿背着杂物赶路，路上连续遇到空袭警报，她实在走不动了，这时看见了路上盛开的八重樱，她说：“生活这样的艰苦，且来欣赏欣赏花儿的美吧。”



和平公园的纷纷落樱，不正是在提醒人类：不要再去践踏、摧残、毁灭美吧！

当我站在和平公园里的时候，我更理解山崎朋子了。我明白为什么事隔这么久，她心灵的创伤却不能平复。不过同时我又相信，她终有一天会以她全部的热诚和力量来广岛采访，写出一部反映战争这个恶魔如何



肆虐社会的报告文学。

是的，等下次我见到她时一定再问问她。她常来中国的。日本不少记者愿意往西方跑，她喜欢往中国跑。她的丈夫——日本儿童文学家上笙一郎对我说，他还想去敦煌，还想再去北京的琉璃厂呢。

琉璃厂？到了琉璃厂，就快到我北京的家了。我一下觉得和上笙一郎、山崎朋子更加接近了。



我的世界语

行动计划败露——除了笑，我还能佐藤做些什么呢——两个嬉皮士向我们走来——酒吧老板迎了出来——跨越国界——口误——我从车窗里隐隐看见——飞机往前开，心绪往后倒

行动计划败露

我又开始策划一个行动。

我看看表：九点。若是在我北京家里，一到晚上九点，沉沉的夜幕早已把我和世界隔开了。我只能困守在家里，也只想蜷缩在家里。但日本松山市的夜九点，像一个穿着夜礼服的珠光宝气的美人，叫你不能不想多看她两眼。而且，愈是临近回国的日子，我的好奇癖和观察癖愈是发作了。不过，我不能再拖累同车的三位先生。等我们回到下榻的松山全日空饭店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事务局次长佐藤纯子先生（日本对女士也可尊称先生）和事务局



长辅佐横川健先生看着我乖乖地走进饭店，他们就可以安心地休息了。当然，我不能不和一起回来的邓刚打个招呼，告诉他我一个人再到旁边的街上走一走。我们这个五人的中国作家代表团，团长张光年和副团长从维熙，从学问到声誉到年龄，都是我等不可望其项背的。到他们这样的年龄自然不能像我这样疯跑。第三号种子邓刚是我们团里的年轻人。

“我不同意你出去！”邓刚大吼。

“现在我是第三副团长！”他又加上一句。大概是觉得情况紧迫，只好自封为“第三副团长”来加强他讲话的权威性。

“第三副团长”的吼声一下把我的行动计划败露了。

除了笑，我还能佐藤做些什么呢

佐藤先生和横川先生立刻帮我从炮击般的吼声中解救出来：时间还早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吧。

我觉得我被两股相向而行的感情冲击着——我终于战胜了“凶猛”的“第三副团长”，我出游的计划“得逞”了，这自然叫我高兴。不过，我看着佐藤和横川，又实在非常地不安！我们是前天傍晚坐船经濑户内海到达松山的。船在六七级的风浪中颠簸，这种颠簸对于我来说，是大海的摇篮，于是我睡着了；对于佐藤先生，则是大海的戏弄，事后我才知道她难受得无法支撑，连连唱了二十几支歌（而且是中国歌）才顶住了风浪的袭击。下船时风雨交加，一顶伞哪里挡得住满天雨？佐藤纯子又晕船、又受了凉。可是昨天清晨一见面她就问：你们睡好了吗？上午、下午、晚上照样陪着我们活动。今天又是一天了。“你累吗？”我一边走一边问她，这句话是真诚的，但又是毫无意义的。邓刚立刻“揭穿”我：“你一边



问人家累不累，一边又往前走，非要把人累死！”

我歉疚地笑笑。除了笑，我还能给佐藤做些什么呢？

两个嬉皮士向我们走来

横川健同时在接待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。昨晚赶到松山，他在松山市长为我们设的餐会上做译。他那一口中文使得我觉得他简直就是中国人！今天拂晓四点，他就分别来按我和邓刚的门铃，唤醒我们去渔场。然后是参观菜场、美术馆、农村，直到刚才陪我们去池内先生家，直至现在我又要出去。其实我真觉得晚上街道上全是霓虹灯，我一个人走走根本不会有事。可是事后邓刚告诉我，这晚他和横川走在前边，我和佐藤走在后面，中间拉开了一点距离。两个嬉皮士模样的人从他们身边擦过向我们走来。邓刚看见横川先生紧张地、但又不着痕迹地一下转过身来看着我们，生怕嬉皮士招惹我们。“我一看他那样，”邓刚说，“我也作好了准备——一旦你们出事我拔腿就跑。”这是邓刚式的语言。我于是明白佐藤先生、横川先生为什么一定要陪着我。我正在兴头上，完全

没有注意到嬉皮士，而佐藤和横川为了保护我的这份兴致，为了使我尽兴，真是尽心、经心啊！



酒吧老板迎了出来

那晚我们走过一家酒吧，我很想进去看看，但我身上没有料（日本

管钱叫料，需要花钱的事叫“有料”，不花钱的叫“无料”），所以只能希望打开门看一下。酒吧老板迎了出来，自然以为我们是顾客啰。佐藤对老板说我们是中国人。老板立刻把我们让了进去，送来四大杯加了冰块的酒。当然这是“无料酒”了。一个团体正在酒吧里举行聚会。他们腾出座位拉着我们坐下，而且拽着我的背包直说：你不要走，你不能走！一个日本姑娘亲切地走到我的跟前：“我最希望去的国家就是中国！”



我想起下午在松山农村时，一位可爱的农妇兴致勃勃地问我：“昨晚你看了电视里日本和中国的女子排球赛了吗？”我问她：“中国女排赢了日本女排，你高兴吧？”“高兴！高兴！”她连连点头来加重语气，漾出一脸笑纹。

我们从松山农村回到市区后，就去松山南海广播电视台的池内央先生家做客。池内先生一听说邓刚是大连人，立刻拿出两盘录像带放给邓刚看。一盘是1932年的大连，一盘是今日大连。因为，他是生在大连的。在池内家的两小时，池内先生不知道拿出多少道的冷饮、点心、酒菜来款待我们。明明是穿裙子、单衣的季节，他还怕我们凉，特意开了暖气，融融暖气和一道道的冰淇淋，使我们在两小时里饱尝了日本人民的盛情。

跨越国界

又一天我们从街上夜游回到新大谷饭店后，我才知道日中文



文化交流协会的佐藤祥子总要看着我们回来才能放心地回家。我跑到她那儿说了一串感激的话。是因为不知怎么表达心中的感激，还是因为在感动和激动的冲撞下派生了语言的灵感，我这一串话竟夹杂着刚学来的两句日语、大学时代的英语、小学时学过的几句俄语乃至我青少年时代一直讲的上海话。说完了我自己觉得太可笑。亏得佐藤祥子只感受着我的真情，顾不上注意我说了些什么。中日人民跨越国界的友情派生了我这种跨越国界的“世界语”。我们一起笑了起来，笑着迎接中日友谊新时代的到来。

正因为过去有那么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，所以这个时代的人民就更加希望那样的时代永远不再出现，中国和日本已经结成七十三对友好城市。七十三对友好城市，佐藤、横川、池内……啊，友谊的网络，感情的网络！

口 误

一盘水果擅自来到我的房间。

可不吗，我们是第一次走进东京的新大谷饭店，我是第一次走到我的457房间，可是怎么的，我的窗台上怎么放着一大盘水果？香蕉、桔子、草莓，搭配得像静物写生一样美，美得使人产生一种不仅用眼睛来欣赏而且要用嘴来欣赏的欲望。可是，这盘水果是哪来的？

我终于发现水果里有一张名片，原来是中岛健藏先生的夫人中岛京子送的。

啊，一种宾至如归的温暖感。

晚饭时光年同志问起我们房里是不是都有一盘水果？我们一齐坦白：有。而且已经吞食若干。光年同志不知是不是因为他与中



岛健藏先生的友情，所以想保留他那盘的观赏期，他显然没有惊动水果。“我刚才在家里沏了壶茶。”他说。

在家里？当然他是口误，他是指他那房间。如果他没有产生宾至如归的感觉，就不会产生这种口误吧。

我从车窗里隐隐看见……

日本企业家是精明的，日本精工表是精确的，日本随处可见的小商店是精巧的，日本人民表达友谊的方式是精致的。我们去拜访奈良药师寺的安田夫人时，看见她在客厅里已经插上了中、日国旗。晚上她请我们上饭馆吃饭，那饭桌上也已经插好了中、日国旗！我们离开东京到箱根小涌园饭店时，只见饭店大门口挂着“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”的横幅。第二天离开箱根时，只见饭店门口又打出一面挺大的五星红旗。几个服务员一人举一面小的五星红旗站在大门口。我们的小轿车开出了很远，我从车窗里还隐隐地看见他们举着我们的国旗。

后来，当我在松山的南海电视台又看到会客室的桌上插着中、日国旗时，已经习惯于日本人这种表达感情的精致了。不，我还是惊讶了。因为在这两面国旗上面的墙上，挂着一幅画着黄河的画。日本朋友说，这是为了欢迎张光年先生的到来，欢迎这位《黄河大合唱》的作者的到来特意挂上的。

飞机往前开心绪往后倒

在日本，我时时觉得好似回到了家里——祖国，甚至产生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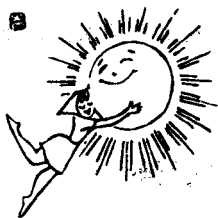


种幻觉——本来就没有离开家里。在松山市的三天，更加深了我的恍若没有出国的感觉。12日下午在松山市政府，市长中村时雄致欢迎词，横川健先生翻译。中村市长说到一半，突然望着我冒出一句中国话：“陈先生，我看你很像日本人啊。很对不起。”我们团的同胞们笑了起来。我想，日本人、中国人本来就长得一样，我们在箱根穿上和服，便成了五个日本人。日本人要是穿上旗袍，就成了中国人。横川先生用中文说：中村时雄先生普通话讲得非常好。中村先生说：“因为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。”

中村市长难忘他在北京学习的岁月，尤其难忘中国朋友对他的深情厚意。不知是不是因为中村市长的关系，整个松山的市风都透着对中国的特别的感情。我到菜场时，看到和蔬菜批发公司正在讨价还价的人群，从下往上一排一排地站着，像大合唱队似的。突然人群中走下一个人来跟我紧紧握手。因为他看出我是中国人。我在街上走时，有一个店主从货架后远远地对我喊：“你好！”然后是简单而热烈的寒暄，因为我是中国人……

松山市的中学生代表团去年到北京参加了中日青年的联欢。团长是市政府的四号人物明比文治先生。市政府招待会上，我

正好坐在他的旁边。我一边和他讲话，一边看着电视机正在播放的去年明比团长一行在中国的活动。这又是日方精致的表达友谊的方式，使宴会气氛更活跃，也使中日友谊更具立体感。以至我在松山坐上飞机前往东京时，人虽然已在空中，已经远离松山，但我的思绪、我的感情正在和这架飞



机的航程进行时空交叉——飞机往前开，我的心绪往后倒，倒回到松山那个菜场、那个街道、那个市政府、那个放大连录像的温暖的屋子……

中日两国源远流长、千丝万缕的联系啊！有一次日本朋友问我这次出国的感觉。我说我的感觉是：好像没有出国。松山一位日本朋友让我题字（我那可怜的、可怕的毛笔字哟！），我在松山密密的情意中，竟写了一句硬绷绷的话：“愿日本和中国共同迎接世界的挑战。”

